

宁德师专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年第2期  
(总第77期)

# 压抑、张扬与超脱

## ——两汉与魏晋文士自嘲意识之比较

章 雯

(厦门大学中文系[2003级研究生], 福建厦门 361005)

**摘 要:** 文士在作品中的自嘲, 蕴含着文士的文化人格、产生的社会 and 思想背景等深广的文化内涵。汉代文士的自嘲意识与“士不遇”相关联, 由文士的儒家人格与其在政治上失意决定; 而魏晋文士的狂狷抗争式自嘲与恬然超脱式自嘲, 则是由其反儒倾向和道家人格决定

**关键词:** 两汉; 魏晋; 文士; 自嘲

李欧梵先生曾不止一次提到: 作家写作时应该“投入”, 但也同时必须保持艺术的“距离”; 没有距离感, 是无法做深入的嘲讽的。<sup>[1]</sup>自嘲, 即是人们在身处逆境时, 与自己的困顿保持距离, 冷静思考, 微笑对待, 借以解脱、超越自我, 是一种“智”而“达”的幽默感。

—

在中国, 自嘲意识可以追溯的历史非常久远, 先秦名人趣事和俳优滑稽表现中就已体现出鲜明的自嘲意识。至于自嘲意识进入到文学领域, 则最早体现在汉初一批活动于皇帝身边的文学侍从身上, 以东方朔为代表。

东方朔生活在汉武帝鼎盛时期, 却一生郁郁不得志, “辞数万言, 终不见用。朔因著论设客难己, 用位卑自慰喻”。(《汉书·东方朔传》)他的《答客难》以托辞自嘲的方式, 博闻辩智者的口吻, 对贤士不遇于盛世的社会现实, 表现了强烈的不满。文章开头虚拟“客难”以引出赋文题旨。客问: 张仪和苏秦生处乱世, 却“身都卿相之位,

泽及后世”, 而你东方朔“自以为智能海内无双”, 其结果却是“官不过侍郎, 位不过执戟”, 因此客不得不问“其何故也?”这种设问式的自嘲, 隐含了作者极大的辛酸和悲哀。作者针对客问, 分析苏秦、张仪和自己所处不同历史环境, 说明“时异事异”的道理。东方朔将春秋以来宫廷俳优滑稽引向文人内心, 发展了俳优自嘲的一面, 表现为自我贬抑、自我调侃的情感宣泄, 充满无可奈何的悲剧况味, 他也由此成为文学创作中自嘲之祖。扬雄的《解嘲》模拟东方朔的“答客难”, 同样表现了封建专制政权下的士人心理, 为缓解与统治秩序的冲突, 以自嘲的形式出现, 聊以自救。

文士在作品中的自我贬损、自我调侃貌似“豁达”, 其实“豁达者在悲剧中参透人生世相, 他的诙谐处于至性深情, 所以表面滑稽而骨子里沉痛”。<sup>[2]</sup>越是理智的人, 越能感受“造化弄人”而无能为力, 只能无奈的开开命运的玩笑。“自嘲意识”正是士人在流尽了辛酸泪之后, 剩

\* 收稿日期: 2005- 12- 30

下的无可奈何的笑——嘲笑自己,嘲笑“客”;嘲笑无比荒谬的历史和人生。《答客难》式的自嘲无疑是一种精神胜利的征服,是一方解脱人生苦痛的安定剂。汉代文士的“自嘲意识”让人感受更多的不是它的诙谐幽默,而是一个人突然洞察自身悲剧而产生的一种极度痛苦所带来的无比沉重和巨大震撼。

值得注意的是,文人在嘲笑自己困境的同时,对封建帝王的好恶决定贤士能否用于世的现实有清醒的认识,并以戏谑之言揭示帝王用人心理:“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渊之下。”(东方朔《答客难》)另外,自嘲中还包含着不与同流的强烈的自尊。

## 二

到魏晋时期,以“自嘲”的方式写作已然成为一种风格。与前代相比,该时期文士“自嘲意识”有其鲜明的特点:自嘲中少一份无奈的悲鸣,而多一种主动的、宣泄的、决绝的力量。如在司马昭意欲篡魏之时,嵇康的好友山涛迁升,想举荐嵇康代其原职,嵇康于是作书与山涛绝交。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称自己“少加孤露,母兄见骄,不涉经学。性复疏懒,筋弩肉缓,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闷痒,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转乃起耳”,更有例举“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以说明自己不合适做官。作者故意用生活中的一些琐碎之事为幌子,夸张他对官场的厌恶感,以表明自己拒绝参政的决心。这种自嘲不是轻松的调笑,也不是因无奈而求解脱,而是作者的自我肯定与自我欣赏,表现了他的刚毅和自负。而且,这种自嘲表面上虽不乏风趣,骨子里却是充满愤懑情绪的。作家以“自嘲”张扬个性,嘲弄多少人梦寐以求的高官要职,讥讽旧的价值观,张扬抒发性灵的新的价值观。我们可以看到在可笑的形式下隐匿着的战斗与批判的锋芒。

除了前述狂狷抗争式的自嘲,此时还有一种恬然超脱式的自嘲。魏晋士人因受到外部秩序压迫,转而追慕老庄,寻求解脱。他们将主体精神提高,以自身的智性洞察面对现实,从而轻视外部压力,如刘伶在《酒德颂》中自谓是“大人

先生”,他的“纵意所如”、“惟酒是务”的行为招来了“贵介公子、缙绅处士”的非议。刘伶借助自嘲,完成了自我意识的超越,“先生于是方捧罌承槽,衔杯漱醪,奋髯箕踞,枕罌藉糟。无思无虑,其乐陶陶。……俯观万物之扰扰,如江汉之载浮萍”。刘伶以提升自己的主体精神,从而居高临下地去“俯观万物”,轻视万物如长江汉水上的浮萍,从而超脱自己,获得心理平衡。再看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作者淡淡自语:“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并非没有遗憾和缺陷,但那一丝自嘲已经化入一片自得自足的叙述中了。读书、饮酒、写作使陶渊明有了精神寄托,使他不慕荣利,面对困窘的生活而感到平静安逸。这种恬然超脱式的自嘲除了揶揄、谐趣之外,更是作家在超越了狭隘的对人类生命无条件肯定之后的一种智者的“彻悟”,是体验了悲剧性之后对悲剧性体验的“超脱”。这种“自嘲意识”表达了自适自在的存在主题,并抗拒政治、道德等种种强制力量对个体自由精神的入侵。

上述魏晋文士的两种自嘲意识具有意味深长的差异性:狂狷抗争式自嘲是以自嘲为中介,意在嘲弄整个外部世界。恬然超脱式自嘲,无意嘲己,不屑嘲人,意在完成自我精神的建构。

## 三

魏晋文士的自嘲意识与汉人之所以有不同的表现,既有来自于他们各自不同的经历和性格的原因,也与外部的政治环境和个人的文化人格不同相关。

汉代文士的自嘲意识自东方朔肇始其端,它一开始就与士不遇的主题相关联,与士人的儒家人格有关,与君主控制了文人的政治命运直接有关。受儒家学说熏陶的文士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理想人格,而现实中士人的政治命运控制于君主手中。士人的理想人格与现实的专制政治不免发生冲突,但儒家教义又要求绝对服从君臣纲常,这本身就包含内在矛盾。在进退失据中,文人们只能以自嘲来自解自

救了。汉代文士如东方朔、枚皋之流,地位仅同先秦宫廷中的俳优,他们的自嘲意识是由于在政治上不得志产生的。

魏晋时期,文士的自嘲意识多是与反儒倾向,或道家人格有关。当时,维系人心道德的儒家学说一天天失去了它的尊严,士人们开始以怀疑甚至是嘲弄的眼光看待祖辈们顶礼膜拜的儒教。魏晋文人任诞之风大作,阮籍醉酒,王羲之坦腹,刘伶裸体等等,都表现出对礼教的蔑视,而自嘲正是名士们在高压恐怖的政治环境下,富于机智的抗争手段之一。以自嘲来衬托儒家思想虚伪的一面,以自嘲来肯定自己张扬个性。魏晋文士的自嘲包含着无比的快感和正义感,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

魏晋文士的自嘲意识还与道家思想有关。道家主张“无为”、“自然”,追求个体的生命自由,显然与儒家强调将个体纳入群体规范迥然不同,具有反儒倾向的魏晋名士自然转向老庄,于是道家思想便成为文士自嘲意识的精神支柱。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自称“少加孤

露”、“性复疏懒”、“筋弩肉缓”等等,看似皆自我贬损之辞,其实是对自我的肯定和欣赏,因为这些“顽疏”的性格正是他所张扬的“真性”。嵇康的自嘲是因其“笃好老庄,贱物贵身。志在守朴,养素全真”(嵇康《幽愤诗》)的人生追求为根底的,追求的是免祸养寿。《五柳先生传》中,陶渊明的自嘲不但坦然甚至有些自得其乐,而这也是以道家思想为根底的,他在《神释》诗中说:“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忧”,这正是道家任自然的观点。魏晋名士超越名教的僵硬教条,发扬老庄哲学中逍遥自适的生活原则,从而具有一种真率活泼的心灵,而自嘲即是他们张扬人性和现世解脱的一个契合点,这是一种骨子里的幽默。

综述全文,文士在作品中的自嘲,无论是两汉还是魏晋时期,都不是廉价的轻松和谐谑,而是蕴含着文士的文化人格、产生的社会 and 思想背景等深广的文化内涵。文士“自嘲意识”的背后,交织的是深沉的感伤、冷峻的怀疑和恬然的超脱,是一种形而上的幽默。

#### 参考文献:

- [1]李欧梵.世界文学的两个见证:南美和东欧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启发[J].外国文学研究,1985,(4).
- [2]朱光潜.诗论[M].北京:三联书店,1984.

[责任编辑 林 石]